



《唐诗三百首》： 天意君须会 人间要好诗

文 | 本刊特约撰稿 海滨

让经典流行起来

中国是诗的国度，唐诗达到了中国古代诗歌的巅峰。据清朝康熙年间编定的《全唐诗》所录，诗作近5万首，作者2000余人，当然实际数量远不止此。唐诗选集种类繁多，不啻千百。可是，最盛行、最有影响的却是一册为学童编选的大众化选本《唐诗三百首》。从乾隆28年(1763年)成书开始，这个选本迅速超过了其他各家大小选本，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，即使到了当代，《唐诗三百首》仍是家置一册的最好的普及读本。本书一版再版，而且各种注释、译解、图解之作和续选、新选之作纷纷面世，国内各种版本和英文、日文等译本达到200多种。

聚集唐诗经典

《唐诗三百首》收录了77位唐代诗人的诗作，差不多将唐诗名家都囊括在内，在名家中又突出大家。杜甫、李白、王维、李商隐、孟浩然、韦应物、杜牧的诗占全部选诗的三分之一。有些诗人选诗虽少，但代表性名篇皆有收纳。诗人分布在初盛中晚四唐，其中盛唐最多。这样比较真实、合理而突出地反映出唐诗的成就与概况。同时书中也选了皇帝、诗僧、歌女、无名氏的作品，这不但扩大了所选诗人的覆盖面，也准确反映了诗人队伍的庞大与复杂。

《唐诗三百首》内容丰富而名作荟萃。选诗内容丰富多彩，记录自然美景，书写人生日常，反映重大事件，总结历史教训，应有尽有。隐居、应试、落第、恩遇、迁谪、思归；边塞、从军、生离、死别；相思、重逢、慈幼、慕亲；登临、怀古、咏物；听琴、赏画、观舞……凡此种种，广泛包罗，合而观之，可以得到唐代社会生活和唐人心灵世界的一个艺术缩影。严羽在《沧浪诗话》中说：“唐人好诗，多是征戍、迁谪、行旅、离别之作，往往能感动激发人意。”本书选诗的确也反映了这一特点。311首诗，长篇如《长恨歌》，短制如《春晓》，诸多唐诗名作，荟萃此编。

《唐诗三百首》选录的诗人大多是诗艺纯熟的诗家“射雕手”。诗艺纯熟的最高标识是诗人的个性。诗仙李白的豪放飘逸，诗圣杜甫的沉郁顿挫，诗佛王维的诗中有画，诗魔白居易的晓畅通俗，诗豪刘禹锡的旷达沉雄，七绝圣手王昌龄的清畅雄浑，五言长城刘长卿的清旷淡雅，孟浩然的淡泊清逸，高适的慷慨悲壮，岑参的雄奇弘阔，李商隐的精工典丽，杜牧的俊爽清妙……能体现这些诗人创作个性的代表作，诸如《将进酒》《登高》《山居秋暝》《锦瑟》《江雪》《泊秦淮》等被悉数纳入。



↑清朝苏六朋的《太白醉酒图》。

↓杜甫像。



《唐诗三百首》。

《唐诗三百首》是在科举考试时代为学童准备的教科书，其定位非常清晰。编者坚持的标准，如其序中所言，是要选择唐诗脍炙人口之作中的精品，按诗体编录，作为家塾的课本，让人在孩童时背诵学习，长大后体验揣摩，白首时也无法忘怀。也就是说，编者要选出的这册唐诗，既是可供童子启蒙背诵的读本，也是让他们应试创作时可以仿效的范本。

我们知道，很多时候，流行的文学作品不一定是经典，经典的文学作品不一定流行。那么，选出既经典又流行的唐诗，汇编成册，堪称一项功德无量但也艰巨无比的任务。可以说，《唐诗三百首》非常成功地把握了诗歌的规范、儒家的诗教和脍炙人口三个基本原则。

唐诗的创作与流行，是以时序先后自然而然发生的。诗人临境而发，即兴创作，并不一定按照七绝、五律这样的诗体一类一类地创作，读者们也往往凭着自己的兴趣爱好追捧某些诗人某些诗篇，这是一个除了时序之外比较“无序”的活动。但编辑这个选本，就要“有序”，要立诗歌的规范，讲学习的章法，将众多精彩的作品纳入一个有规律可循的框架体系中。本书按照五言古诗、七言古诗、五言律诗、七言律诗、五言绝句、七言绝句这样六大诗歌体裁依次分类，每一类下又基本按照诗人年齿先后排列诗歌，并在每一类末尾再单列出艺术特征相对独立的“乐府”。从古体诗到近体诗，这是有序；初盛中晚四唐依次胪列并突出盛唐，这是有序；每一类诗体作品集中编排，体现诗体的共性规范，这是有序。这种有序的

安排，尊重了诗歌创作和欣赏的规律，尊重了学童认知的规律，是非常科学的。

温柔敦厚是儒家诗教，乐而不淫、哀而不伤是古代社会儒家对“好诗”的基本要求，即诗歌可以表达欢快愉悦的情感但不能过度，可以流露哀婉忧郁的情绪但不能过于伤怀悲切，可以反映民生疾苦和国政阙失但切忌直白激烈地揭露，一切表达都尽可能含蓄柔和。这种儒家诗教固然有其片面性，但在文字狱盛行的那个时代，一本诗选想要刊行，首先得严格遵守诗教。因此，我们发现，《唐诗三百首》在内容上婉拒了愤怒、狂放的极端倾向，在艺术上婉拒了奇险、过分的逞才炫技。但可能恰恰是这种貌似中庸的选择，使得这个选本经得起审查、审视、审美的考验，最终安全、稳健地流传开来。

编选者在序言中申明要选择脍炙人口的唐诗，朗朗上口、易于传诵就成为重要的编选标准。举个例子，大家熟悉的李白《静夜思》原文作“床前看月光，疑是地上霜。举头望山月，低头思故乡。”但在长期口头流传过程中，尤其是在明朝，“看月光”被人们改成了“明月光”，“望山月”被改成了“望明月”。本书的编选者文献学问功底厚重，当然知道李白原文写作“看月光”“望山月”，但他却把家传户晓的“明月光”和“望明月”的版本编进了《唐诗三百首》，明明白白地落实了“脍炙人口”原则。

这样的选本，学生喜欢，老师欣赏；考生追捧，考官认可；教育圈内，人人接受；社会大众，个个崇尚；唐诗经典，就此流行，是必然的了。

衡塘退士是谁？

《唐诗三百首》的编选者孙洙(1711年~1778年)，号衡塘退士，江苏无锡人，是清代乾隆年间一个不出名的小官。孙洙天性颖悟但家境贫寒，早年读书孤苦，每到隆冬时节，无以御寒，手中就常常握着一块木头。人问何故，他回答，按照五行相生的说法，木生火呀！孙洙进入仕途，担任过县官、学官、考官。他先后在三地担任县令，明察暗访民间疾苦，清正廉洁，两袖清风，夙兴夜寐，造福一方；平日与百姓讲话，如家人父子一般平易近人；有人触犯刑律，要鞭答处罚，衙役还没有动手，孙洙先黯然落泪；其疼惜百姓如此，百姓对孙洙也是感激涕零，罪犯诚心悔过，良民勤心耕读。他担任考官，善于衡文辨

才，为国选才；他担任学官，更是引导一地文治教化，教育生童勤勉读书。

孙洙与妻子相敬如宾，恩爱和睦。他在公务、教务、考务之余，唯一的爱好就是恭恭敬敬一丝不苟地读书，宗法杜甫创作格律诗，和雅好书画的妻子徐玉兰一起斟酌词句，品鉴诗篇，共同完成了《唐诗三百首》的编选。

孙洙是勤政爱民的县官，精于诗艺的学官，长于识才的考官，一生孜孜不倦，默默无闻，名不见经传，但却以古代文人心中最高的诗歌经典“诗三百”(《诗经》)为企慕的理想，以民间谚语“熟读唐诗三百首，不会吟诗也会吟”为检验标准，为当时的学童和现在的读者编选了最合适的唐诗选本《唐诗三百首》。